

亚斯尔·十娃子的创作个性与文化资源

常文昌

(兰州大学 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 十娃子是东干书面文学的奠基人, 同时又代表了东干诗歌的最高成就。在世界华语诗苑中, 他的创作别具一格, 不仅文字和语言独特, 其内容与诗形都令人耳目一新。他的诗歌创作资源, 除了苏联现实生活与东干族自身的穆斯林文化外, 还有三大文化资源, 即俄罗斯主流文学的影响, 周围吉尔吉斯、哈萨克、塔塔尔等其他民族亚文化的影响, 特别是中国文化是其创作的重要资源之一。东干人认同中国文化, 是其区别于周围其他穆斯林民族, 从而使东干族自立于中亚 120 多个民族之林而不被同化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 东干文学; 十娃子; 诗歌

〔中图分类号〕 I106.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 (2009) 02-0126-06

在世界华语诗苑中, 中亚东干诗人亚斯尔·十娃子是一朵奇葩, 他开辟了一条诗歌创作的俗白道路, 令读者耳目一新。十娃子独特的创作个性表现在哪些方面?

首先是独特的诗歌语言。在世界华语诗歌中, 像十娃子这样完全用白话方言口语作诗, 是少见的。上个世纪 30 年代, 受俄罗斯汉学家的影响, 中国学者提倡汉字拉丁化, 但在中国并未实践, 东干人创制拼音文字代替汉字, 一直运用到现在。在世界华语诗歌中, 有的语言颇为典雅, 如日本汉诗, 完全是中国旧体诗的语言与形式, 放到中国古典诗中可以以假乱真。早期美国华语诗歌旧体诗也颇多, 而欧美及东南亚新诗, 也有趋于口语化的, 但没有像中亚东干诗歌这样地地道道的西北农民方言口语诗。西北花儿、信天游等民歌是真正来自民间的口头创作, 语言是口语, 如写旧时的大脚妇女“脚大手大你莫谈嫌, 走两步路干散(麻利、潇洒)”。文人笔下的

口语诗也多为规范的普通话诗。有谁能相信运用东干话(西北方言口语)不但可以写诗, 而且还能写出好诗来? 十娃子做到了, 给我们以惊喜, 以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让我们看到诗还可以这样写。例如: “一朵鲜花开的呢/ 就像火焰/ 绿山顶上开的呢/ 我看得显。”(《我爱春天》) 艾略特和中国的穆旦都有为人传诵的以火焰比喻鲜花和春草的名句, 十娃子也以此作比。又如: “雁飞的呢, 犁铧尖/ 就像早前/ 就像星星, 离我远/ 看得可显/ 还唱的呢, 古代音/ 不叫心闲/ 就像报的: ——我来哩/ 衔的春天。”(《雁飞的呢》) 完全是西北方言, “开的呢”、“飞的呢”都是表现在时态的, 即动作仍在进行, “像星星”、“古代音”、“衔的春天”三个关键词将诗提升到美妙的境界。十娃子用清澈见底的东干口语创作出如此意境优美的诗作, 令人大开眼界。以“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来概括十娃子的艺术风格, 是最为恰当的。

〔收稿日期〕 2008-11-27

〔作者简介〕 常文昌(1947-), 男, 甘肃镇原人, 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东干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编号: 03JB750. 11-44010) “世界华语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东干文学定位”阶段性成果。

其次是流贯在诗中的顽强乐观精神。十娃子的创作处在苏联的上升时期，加之东干坚韧顽强民族精神的熏陶，出身于铁匠家庭的诗人从小就形成了坚强乐观的个性。在十娃子的诗歌中，我们会感受到一个鲜明的诗人自我形象，一个对生活无限热爱与执著的形象，一个麻雀也没伤过，别说宰羊的善良形象，一个向世界播种鲜花和喜悦的形象，一个桃树般经受狂风暴雨打击而坚强挺立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在《我四季唱呢》中，诗人要像中国的伟大诗人屈原一样歌唱，但不跳江；要像俄罗斯的伟大诗人普希金一样歌唱，但不变成铜像。要像天山像蓝天一样成百年、成千年的活下去。诗的结尾忽发奇想：“那塔儿我旦防不住/叫老阎王/把我的命旦偷上/连贼一样/高抬深埋旦送到/梢葫芦乡/赶早我可出来呢/百灵儿一般/——好吗，春天，小姑娘/银白牡丹！”这是一首奇诗，诗人想象要死而复生，每天迎着太阳放声歌唱。可见他对生活的执著与热爱。直到80岁的高龄，诗人写下《有心呢》这首耐人寻味的哲理抒情诗，面对眼睛麻、耳朵背，“有多孽障”的老境，仍持乐观态度，认为只要有一颗赤子之心，就不怕眼麻耳背，相反能比年轻人看得更远，听得更显。这种乐观精神贯穿于诗人创作的始终。

十娃子是东干书面文学的创始人，是东干诗歌之父，他的诗歌内容、艺术表现与形式都体现了自己的独特个性，同时也影响了几代东干诗人。迁居中亚的中国回族后裔，其精神寄托有别于周围其他民族。以精神家园为例，十娃子既迷恋于迁居国生他养他的东干乡庄，又怀念祖先的历史故国中国，还向往伊斯兰的圣地麦加，这是十娃子的也是东干人的三位一体的精神家园。十娃子的恋乡作品，以《营盘》为代表，营盘是迁居中亚回民最大的乡庄之一，同时也成为东干人聚居地的代称。诗人将世界最繁华的大都市与营盘做了比较，在感情上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营盘。笔者将十娃子的诗歌《营盘》与尤苏尔·老马的小说《乡庄》、黑亚·拉阿洪诺夫作词、叶塞作曲的歌曲《花瓶》并称东干乡情作品中的“三绝”，不仅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同时也表现了东干民族特殊的情感与心理，而小说和歌曲都受十娃子诗歌的影响。十娃子的《北河沿上》既怀念中国，又怀念麦加，表现了东干人“回族爸爸、汉

族妈妈”的寻根意识。而诗人怀念中国的作品居多，以《我爷的城》为代表，抒发了对银川对中国的思念之情。受十娃子影响，伊玛佐夫和曼苏洛娃分别创作了《一把亲土》和《喜爱祖国》，前者写抒情主人公从银川带回一把黄土，敬献在祖父的坟头，流着眼泪念索尔儿（《古兰经》片段），接都哇。后一首《喜爱祖国》是笔者从国家广播电台东干节目中收听到的，诗人把中国称为喜爱祖国（后来还写过《我有两个祖国》），看见星星落在中国，引发诗情，猜想落在他的家乡兰州，“我的祖辈生在中国/我不得见/大声大声我哭哩/心都疼烂”。由此可见，几代东干人对中国的眷念之情。

十娃子的独特个性还表现在诗歌意象的创造上，他兼具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创作方法，作为现实主义诗人，他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摄取意象；作为浪漫主义诗人，又十分热爱大自然，从大自然中提炼诗歌意象。以比喻意象为例，诗人构建了两大大比喻系统，一是生活比喻系统，即大量的比喻意象来自东干农村日常生活；二是自然比喻系统，许多比喻来自大自然。而同一首诗中两大比喻系统的意象又常常同时并用，相辅相成。如《滩道》写道：“我记的来，大滩道/就像案板/就像媳妇擀下的/没有边沿/就像拿油渗下的/黑土太壮。”以东干媳妇擀面的案板比喻滩道的平坦，以拿油渗下的比喻土地之肥沃，这样的日常生活比喻在中国文人诗歌里是少见的。又如《喜麦的曲子》开头：“喜麦吹的那个笛/有指头壮/就像拿油渗下的/比金子黄。”都是生活比喻，写姑娘漂亮又转成自然比喻，“桃红姑娘长得俊/就像月亮/黑里她旦出了门/世界都亮”。以朴素的方言土语创造出美好的意境。在十娃子的自然意象系统中，尤为突出的两大意象群是太阳意象群和春天意象群，从中可以感受到东方民族“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由于十娃子是播种快乐与鲜花的诗人，即使悲剧情境也充满理想，太阳意象群与春天意象群是为其创作个性服务的，能得心应手地营造乐观氛围和书写理想。

十娃子又是东干诗歌形式的探索者，他所创立的七·四体形式是东干诗歌中运用最多而趋于稳定的一种形式。十娃子试验过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式诗形，也试验过中国的七言体、民歌体，而他自己得心应手的还是七·四体。所谓七·四体

就是第一行七字句，第二行四字句，第三行又是七字句，第四行四字句，依此类推。在这种基本形式中，还可以变换，可以跨行。如《营盘》：“在天山呢生养哩/天山呢唱/在天山呢我跑哩/连风一样/天山的一切滩/一切草上/都有我的脚印呢/我咋不唱？”以轻快的节奏谱写了一曲天山牧歌，句式大体符合七·四体。

诗人去世后，人们在他的墓碑上刻下诗人的四行诗：“好话多说，老朋友/ 伤人心/听话，说的，听音呢/把音拉正。”也是七·四体，这四行富于哲理的诗句已成为读者的座右铭。

十娃子作为前苏联的少数民族诗人，一方面受主流文学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况且俄罗斯文学中产生过世界一流的大师；另一方面，诗人又要坚守属于自己民族的独特文化。为此，我们来探讨十娃子诗歌创作的艺术渊源和文化资源。

东干族作为中国回族的后裔，同时又生活在中亚的社会、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环境中，除了自身具有伊斯兰文化特点（当另撰文论述）外，同时还保留了中国文化的传统，而俄罗斯文化与中亚吉尔吉斯、哈萨克、乌兹别克及其他民族文化的重要影响与融入，也是不可低估的因素。这一点，在十娃子的创作中也有迹可寻。

先看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俄罗斯文学是东干书面文学的重要动因之一。在前苏联，各个少数民族文学无不受俄罗斯文学的深刻影响。根据法蒂玛·玛凯耶娃《东干文学的形成与发展》所提供的线索，十娃子在塔什干教育学院上学期间，就迷恋于俄国古典诗歌，并开始《大学生》杂志上刊印自己的诗作。他熟悉并翻译过普希金的诗歌，写下这样的诗句，由俄文转译如下：“如今我的默默无闻的民族/ 认识了你，神奇的歌手/ 他称你为亲人。”可以说，俄罗斯文学的影响既有显性的又有潜在的。玛凯耶娃在上述著作中提到高尔基对东干文学的影响，^{[1] (P26)} 如果我们对照高尔基所确定的新文学的美学原则，不难发现，这些原则对东干文学，对十娃子都产生过潜在的影响。首先，同旧风俗的遗迹作斗争。十娃子十分热爱自己的民族，同时又对本民族的落后遗迹，深恶痛绝。他的一部分作品对东干女性予以特别关注，不仅对死于封建礼教的女子寄予深切同情，同时又热情支持争取自由的女性。《马家姑娘跑掉了》就是一首回族姑娘反对包办婚姻的

赞歌，这正是高尔基所倡导的同旧风俗遗迹作斗争的作品。其次是创造新的人物，高尔基所确定的这一美学原则，对十娃子同样产生过影响。他的组诗《在我们的营盘呢》是全新的生活气象，全新的人物。有外科女大夫金花，大学毕业的电厂工程师马贵，发电女工三姐，康拜因机手麦燕，种植能手维林等。这些东干人物，以崭新的精神风貌出现在东干文学中，可以说，这是十娃子对东干诗歌的一个贡献。高尔基还论述了民间文学的美学价值，强调加强作家与民间文学的关系。十娃子的诗歌从内容到形式，与民间文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些都可以看做是高尔基所确立的新文学的美学原则对十娃子的影响。

在诗歌题材上，十娃子与俄罗斯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才是列宁》、《列宁——世界光》等关于列宁题材的诗。玛凯耶娃在《东干文学的形成与发展》中指出，描写列宁的文艺作品，是苏联文学中的重要题材之一，^{[1] (P30-33)} 我们知道这类作品中最著名的是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列宁》。在中亚，列宁曾一度是诗歌中的真正主角。在塔吉克民歌中，列宁被称为兄弟、父亲，十娃子诗中也称列宁为父亲。东干民间关于列宁的作品也不少，口头文学赋予列宁以神奇超凡的色彩，如列宁由星星诞生，有金胳膊金手，他常常借助神奇的自然力量，脱离危险，战胜敌手。把十娃子的诗放在这个大文化背景下，就更能看清它与俄苏文学及中亚文学的联系。《才是列宁》抒写了东干民族曾遭受的苦难及其解放的历程。《列宁——世界光》，被谱上曲子，在东干民间普遍传唱。据赵塔里木研究，这首诗的音乐是“套用了小曲子《弟兄三个人》的曲调”。^[2] 同东干民间文学相比，诗人的创作剔除了列宁的民间神话倾向，赋予列宁以既伟大而又平易的性格。

公民诗，是俄罗斯苏联诗歌的一个传统，从杰尔查文、普希金、雷列耶夫到马雅可夫斯基，贯穿了一条公民诗创作的线索。在公民诗的创作上，十娃子不仅受俄罗斯公民诗的传统影响，同时还受马雅可夫斯基新公民诗的影响。玛凯耶娃论述十娃子初期的创作，偏重于鼓动性和政论体，也是受马雅可夫斯基和别德内依等诗人的影响。^{[1] (P44)} 苏联文学的卫国战争题材相当发达，人道主义主题相当突出，这些对十娃子也产生过一定影响。他创作了一系列反映卫国战争的作品，

不仅表现了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也充满人道主义的人文关怀，如《仗就是他》从人性的角度，从相互残杀者双方的妻子儿女失去亲人痛苦的体验出发，抨击了战争发动者的罪恶。

诗人甚至将俄罗斯民间广泛流传的说法，写成妙趣横生的作品。如《运气汗衫》，副标题为“俄罗斯民人的古话儿”。诗中写道：“穿的汗衫儿养下的——/我听得/这个俏话俄罗斯的/‘谁没听过’/光是汗衫运气大/也不简单。”中国西北如甘肃镇原，认为孩子出生头上、身上有白色附着物，谓之穿白衫，戴白帽，叫戴孝，是不吉利的征兆。而俄罗斯民间看法却正好相反，认为孩子出生穿汗衫，是一生幸运的好兆头。成年人，谁要是幸运，遇事能化凶为吉，则称为穿了运气汗衫。十娃子称苏联给我端下（赠送）运气汗衫，“就为那个我不脱/运气衣裳/黑明就穿的它/连命一样/运气汗衫，好汗衫/运气衣裳/谁的命大，有运气/就能穿上”。诗人融合“俄罗斯古话”，融合得好，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十娃子生活在吉尔吉斯斯坦，他不仅被誉为“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诗人”，还曾担任过吉尔吉斯斯坦作家协会秘书长，与吉尔吉斯作家、诗人有过许多交往。他的部分诗作标明是与吉尔吉斯诗人的唱和与对话。伊玛佐夫在《亚瑟尔·十娃子生活与创作》及《挑拣下的作品》序言——《又是诗家，又是科学人》中为我们提供了诗人与吉尔吉斯诗歌的许多联系。十娃子不仅精通俄文，还精通吉尔吉斯文，他用吉尔吉斯文出版的作品有10余种。同时，他又用东干文翻译过吉尔吉斯诗人如·托科穆巴耶夫、·乌买塔里耶夫、·马里科夫、·托克托穆舍夫、·埃拉里耶夫、·吐尔逊诺夫、·苏塔诺夫的作品。在上个世纪70年代，诗人用东干文翻译的诗集《祖国的早晨》中收录了16位吉尔吉斯著名诗人的作品。80年代，又用东干文翻译了吉尔吉斯诗人·阿德谢娃、·扎格吉耶夫、·阿贝勒卡西莫娃、·茹苏耶夫、·阿巴克罗夫、·萨德可夫、·阿布德卡利可夫、·扎尔肯巴耶夫等作品，结集为《天山的音》。十娃子与吉尔吉斯诗人创作的交流与对话，在其作品中也有迹可寻。伊玛佐夫说，1936年苏联宪法颁布，第二年荐选最高苏维埃代表，为回应这件事，十娃子和吉尔吉斯诗人托科穆巴耶夫、马里可夫、维尼科夫等一同创作《运

气歌》。^[3]这首《运气歌》长达三千多行，副标题为“团体诗文”，即组诗。这首诗的构思与创作与吉尔吉斯诗人的交流是分不开的。当时以东干文、俄文、吉尔吉斯文分别发表。

十娃子的同题诗《白杨》有好几首，其中有一首是给吉尔吉斯诗人·托科穆巴耶夫的。伊玛佐夫说：“特别是他与吉尔吉斯著名诗人·托科穆巴耶夫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都住在捷尔任斯基大街（现在的爱尔肯基克大街），经常在一起散步、交流。亚瑟尔·十娃子曾经写过一首诗《白杨树》，‘献给亲爱的老朋友·托科穆巴耶夫’。^{[4]（193~34）}诗中这样写道：“我爷栽的这棵白杨树/叫我趁凉……/得道哪个小姑娘/把你看上/送给你哩把白杨/把姓刻上/‘托科穆巴耶夫’写得真/刻得也重/你的心到天上哩/有多高兴。”“我爷栽了这个树/这个白杨/送给你哩小姑娘/她的手浪/也是你的白杨树/你高声唱/也是我的，你别吼/这个白杨。”这首诗可谓吉尔吉斯斯坦的诗坛趣话。据说，比什凯克的捷尔任斯基大街，曾居住过东干人，白彦虎晚年就在这儿度过，这里是比什凯克陕西东干人居住区。因此才有“我爷栽的这个树/这个白杨”的诗句。而十娃子的诗友托科穆巴耶夫是著名的吉尔吉斯诗人，曾有一位喜爱他诗歌的姑娘，在白杨树上刻上了诗人的名字。十娃子戏称姑娘将白杨树赠送给了托科穆巴耶夫，托科穆巴耶夫为之高兴，并以《白杨》为题，写了赞美诗，高唱“我的白杨”。十娃子这首诗为唱和之作，两位诗人的相互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类似的诗作还有《天山》，副标题也是“给托科穆巴耶夫”。诗中提及历代诗人包括吉尔吉斯伟大的阿肯和托克托古尔等有关天山的歌。诗的开头写道：“在天山呢生养呢/天山呢长/在天山呢跑哩/连我一样/这个天山你唱过/太阳一般。”可见，这首诗也是唱和之作。

历时性的影响是重要的，共时性的影响同样是不可低估的。在俄罗斯及吉尔吉斯诗歌中，过去时代的诗人对十娃子有过影响，而苏联时代的同代诗人，对他的影响更大。

中国文化资源，在东干文学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所有东干诗人中，十娃子诗中的中国文化资源最为丰富。而中国文化资源又分别渗透在语言、意象、民俗、人物、事件及思想感情等各个层面。

首先是语言。如果说东干人的政治、科技等新术语中俄语借词较多，而宗教语言中阿拉伯、波斯语借词较多，那么，其文学创作中，基本是汉语西北方言，借词的比例要小得多。十娃子提倡少用借词，也体现在他的创作实践中。同是一首诗，俄文与东干文的阅读感受大不相同。只有东干文，才是原汁原味的带有晚清时代语言特点的中国方言。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理由把它划归世界华语文学的范畴。因此，东干文学的文化资源在语言层面上，无论语音、语法、词汇都主要来自中国。

其次是中国意象。十娃子诗歌中，俄罗斯、中亚的自然意象与社会、日常生活意象占有较大的比重。这是由诗人的生活环境决定的。如伏尔加河，是俄罗斯的母亲河，也是前苏联人的母亲河，因此常出现在诗人的笔下。但是，中国意象在十娃子诗中同样占有重要的地位。如黄河，这是中国人的母亲河，也常出现在诗人笔下。在十娃子的诗歌意象中，有些是标志性的东干意象，其中不少意象来自中国。植物意象中最突出的如韭菜。诗人在德国，想念家乡，怀乡诗中想到的是东干乡庄的韭菜；去中国，飞机一过天山，首先闻到的是韭菜味。东干人将韭菜带到中亚，中亚其他民族韭菜的叫法也是汉语的发音，在十娃子作品中，这是带有民族特点的东干诗歌意象。又如牡丹是中国的国花，中国人十分喜爱牡丹。十娃子诗中不但以牡丹作比，还专门写过关于牡丹的诗。母亲、父亲都喜爱牡丹，并精心呵护。白杨树，虽然各处都有，但是十娃子几乎把它作为东干诗歌的独特意象，多次出现。诗中的白杨树，不是我大（父亲）栽下的，便是我爷栽下的。而白桦树，差不多是叶赛宁的独特意象，是带有俄罗斯特点的植物意象。十娃子在《英雄的无常》中，写了一个俄罗斯战士，来自叶赛宁的故乡梁赞，唱道：“我在梁赞住的呢/连叶赛宁/我也肯唱：——桦树呵/春天的俊……”梁赞也成了白桦树的故乡。鸟类意象出现频率较高的是夜莺，东干人叫它“五更翅儿”。这种鸟儿虽然许多地方都有，但在十娃子诗中，五更翅儿成为东干族的标志性意象。诗人听过柏林、黄河沿上五更翅的叫声，虽然也叫得好听，但是在他的感受中，同营盘不一样，只有营盘里的五更翅能打动人心。来自中国的意象，还可以举出许多，如

小姐的床叫“牙床”，皇帝的床叫“龙床”。十娃子《梦先生》诗中的“南山”，应该是陕西的终南山。这些都是比较典型的中国意象。

人物称谓上的中国特点。十娃子在《给后辈》中说：“列宁师父教我哩/就像父亲。”东干词典中“师父”，就是老师，这是来自中国的旧称谓。而中国现代汉语把领袖可以称导师，但不叫师父。《青梅里边的古今儿》主人公（姑娘）的父亲称员外，也是中国旧时对富绅的称谓。《长城》中的唱词：“姐儿生来/本十七/一心想穿斜带衣/这是奴家挣下的/这是奴家挣下的。”“奴家”是姑娘自称，中国现代汉语已不这么称呼，而旧戏曲中的“奴家”称谓极其普遍，中国西北农村农民闹社火，演的旧节目中也常有“奴家”的自称。类似的还有称医生为“先生”，称所爱的姑娘为“姊妹”，称父亲为“大大”、“老子”等都是来自中国的东干人的特有称谓。

以中国为题材，写中国的人和事的作品，在十娃子诗歌中也占有相当的比重。他专门有一本诗集命名为《中国》。其中《上海的买卖》反映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买卖人口的社会现象。《送丈夫》则标明是“中国的红军歌”。《探马》用现代汉语新术语就是侦察员，写女侦察员英勇牺牲。《血路》为太平天国军而作。长诗《活睡梦》写中国工人罢工斗争，其中“伟大中国”、“苦焦甘省”、“山东省”等都标示出中国发生的故事。《真钢》、《宁夏姑娘》等也是中国题材的作品。他的中国题材甚至延伸到“文革”十年，《临尾儿的信》反映了十年动乱时期，与苏联有亲属关系的姑娘牡丹姐所受的迫害。这类写中国人和事的作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歌剧《长城》，其故事来源于孟姜女哭长城。孟姜女、范郎都是民间传说中的人物。东干语汇中没有“演员表”这样的现代汉语新名词，而标明“耍的人”。耍就是演，诗人的《在我们的营盘呢》把演电影，叫耍电影；而唱腔，东干语为“唱的音调”。《长城》的唱腔，拟定了东干民间的十种曲子，分别是南桥担水、姐儿怀胎、送亲人、出门人、小郎过街、寡妇上坟、大姐儿、拉骆驼、张先生拜年、孟姜女等。不同于话剧的分幕，《长城》依中国传统戏曲的结构，分为折子，折子里又分为“头一看”、“第二看”、“第三看”等。从戏剧情节、人物、结构形式、唱腔到道白、唱词，都源于中

国，是东干民族化的艺术。

十娃子创作中的中国民间故事、民间语汇、民俗等影响都颇为明显，除了上面所说的《长城》外，取材于民间故事的还有《梦先生》、《青梅里边的古今儿》、《心狠——折本》等。这些民间故事，又体现了中国人的思想感情与价值观念。《青梅里边的古今儿》中的员外姑娘，在“毒兵对头”闯进花园之前，不愿遭受凌辱，跳了大江。《心狠——折本》源于去太阳山背金子的故事，贪得无厌的人，必然自食恶果。十娃子也运用过中国民间“铁杵磨针”的故事，鼓励青年培养顽强的意志与毅力，去争取胜利。《给屈原诗人》不仅对屈原表达了敬意与怀念，同时也写了中国端午节包粽子，吃粽子，向江河抛粽子的民间习俗。而且诗人也模仿中国人：“我在伏尔加上呢/把你没忘/我也唱了你的曲儿/把你记想/我也把粽子撂哩/往伏尔加江。”十娃子诗中不

仅有秦始皇、韩信等历史人物，同时也有民间传说中的王母娘娘：“那会儿跑到天河上/连鱼儿一样/我浮过去，找去呢/把王母娘。”其中的地名也是中国的，中国人叫“天河”或“银河”，而俄语、英语、德语等都叫“牛奶路”，哈萨克语则叫“鸟路”。韩信在十娃子诗歌中的情况较为复杂，当韩信用大写时，指历史上的人物；用小写则成为一个“共名”（何其芳语），而且是恶的共名。诗人把法西斯叫韩信，把一切恶人都可以叫韩信。原来东干民间故事中，韩信为了做高官，听信神仙的话，把母亲活埋在风水好的地方，与司马迁的记载截然相反。同时又把厕所修在哥哥的井旁。正是受了民间故事的影响，在十娃子笔下，韩信是十恶不赦的恶的典型。

十娃子诗中的中国文化资源相当丰富，以上我们只是列举一些例证。这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文化在中亚东干族中的传承与变异。

〔参考文献〕

- 〔1〕〔吉〕法蒂玛·玛凯耶娃. 东干文学的形成与发展(俄文版)[M]. 伏龙芝: 吉尔吉斯斯坦出版社, 1984.
- 〔2〕赵塔里木. 中亚东干人关于民歌的概念和分类[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2001, (2).
- 〔3〕〔吉〕伊玛佐夫. 又是诗家, 又是科学人[A]. 亚斯尔·十娃子. 挑拣下的作品·序(东干文)[C]. 伏龙芝: 吉尔吉斯斯坦出版社, 1988.
- 〔4〕〔吉〕伊玛佐夫(宏译). 亚瑟儿·十娃子生活与创作[C].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1.

Creative Character and Cultural Resources of Arthur Shiwazi

CHANG Wen-cha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Abstract] Arthur Shiwazi is not only the founder of Donggan's written literature, but also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highest achievement with Donggan's poetry. His writing possesses a unique style in the world Chinese poetry for his special use of language.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his poems brought fresh style to the poetry during his time. Besides social reality in Soviet Union and his Muslim cultural background, three main cultural resources could be found in Arthur Shiwazi's poems: Russian main stream literature; the surrounding sub-cultures, such as Kirghiz, Kazakh and Tartar cultures; Chinese culture took the most significant position in his creation. Identifying themselves with Chinese culture is the important reason why Donggan people differentiate themselves from neighbor Muslim ethnic groups and thereby have never been assimilated with them and remain distinct among more than 120 ethnic groups in Central Asia.

[Key words] Arthur Shiwazi; writing character; artistic resource; cultural resources

〔责任编辑 宝玉柱〕